

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民族，首先有引领世界的世界观——

世界观决定国际治理观

张文木



学术大视野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是世界观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前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

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英国人当时提供给世界的首先是在以往优秀文化——比如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文官制度后面就有中国唐朝科举制的身影——基础上创新出的更为进步的世界观及相应的文化和制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上古时期的罗马、中世纪中国、近代英国以及现代苏联、美国，它们都分别为世界治理提供了较以前更进步的文化观念并由此成为时代文明——尽管美国做得不是太好，时间也不太长——的引擎，而中世纪曾以金钱和拳头豪走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最后在历史中留下的仅是一段“土豪金”的传说。

中国的 worldview 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中世纪的中国曾在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中成为文明的引擎，它提供了包括制度文明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中国文化就曾经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家的热捧。

实践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与“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和“耕”联系在一起的道理一样，中华文明始终与以民族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比如，中国人对“福”的理解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它本身就是“节制”思想的再阐

发。“福”，示(礻)字旁，《说文》：“示，神事也。”崇拜之意；“畀(fú)，满也”，不求多。中国人为什么要拜一口田？有一口田就饿不死，当然也撑不死。没有吃的会饿死，这叫唯物论；但吃多了会撑死，这叫辩证法。这个道理用于国家治理就是国家之福在于节制：不屈服也不扩张；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就是中国文化及建立其上的中国战略，也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曹操在《龟虽寿》中说“盈缩之期，不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毛泽东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

围绕“福”字形成的有节制的世界观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韧性，中华民族坚守“一口田”，又决不扩张，这个特征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至今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与西方的“马太效应”和“上帝选民”的价值观念不同，中国国家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基于节制和平衡认识的国家“养生”的思想，平衡和节制是贯穿养生学问始终的观念，也是中国古今战略思想的核心。

历史上但凡有生命力的民族都是注重实事求是的民族，同理，将实事求是注入民族灵魂的民族则一定是青春常在的民族。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

中国先进的世界观产生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现实的总要高于天边的。天下道理，须出自“实事”，天下“致知”必先“格物”，中国人常说“事情”“事理”等，不管是“情”还是“理”，在中国人这里都让位于现实中的“事”。事成情至，人的感情是靠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而成功的事业更是联系人心的纽带。这显然比西方的所谓“契约”关系更为先进，尽管“契约”关系又比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更为先进。

要干事，就必须团结。团结就必须是一个中心。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忠不是没有“对立”

即矛盾，在中国文化中处理矛盾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所以中国人不喜欢“二”，“二”数的内容中国人多用“双”“俩”来表达，其感情倾向也是强调事物的统一性。《荀子·议兵篇》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而西方人喜欢康德的“二律背反”，结果欧洲版图被弄得支离破碎。

先进的知识都是来自生死经验而非天国的“呼唤”。西方人也经历了国家分裂的痛苦，也渴望统一，但中国人对于统一的认识要比西方来得早而且深刻，这是由于中国人比欧洲人先经历了国家分裂的痛苦。周朝末期，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分封制有极大的兴趣，当时“少正卯”之类的知识分子只看到国家分裂带来的个性释放，而看不到分裂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当时孔子就为了阻止国家走向分裂而四处疾呼。今人只看到孔子复旧，却没有看到孔子复旧的目的是为了统一。二百多年的战国经历让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分裂没有任何好处，由此统一的要求才深入人心。我们一些人认为秦统一中国是“暴政”的结果，其实那是人民支持的结果。没有人民的支持，纵使秦始皇有三头六臂，也完成不了统一中国的任务。中国人民从二百多年的分裂战乱中认识到统一的价值。西方从古罗马开始有九百多年的和平期，这使欧洲人——与中国周朝末期的人一样——不珍惜大一统的价值，也热衷于搞分封(分裂)并赞扬其中的个性释放。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战乱期，与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一样，查理大帝再次将欧洲统一，但由于查理大帝没有做好秦朝那样的制度保障，结果它的帝国又重蹈中国周王朝解体后果。公元843年，在欧洲版图的中心地带分裂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当时欧洲人欢欣鼓舞，认为这下能有自己的“国家”了，也有机会当“国家领导人”了。

从中国地带分裂的国家最难复合。中国二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就是从即“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

是选择这个事件为开篇。欧洲也是从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的交界处三分天下的。统一后的中国，一个大王朝接着一个大王朝，罗马之后的欧洲越分版图越碎，国家越来越多，以至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而且迄今我们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前景。

与亚洲中间国家大、周边国家小的地缘政治特点正好相反，欧洲中间国家小，周边国家大。为什么？兄弟阋于墙，外人得利。美国怎么起来的？就是由于当年欧洲内斗。1803年法英宣战，拿破仑就把路易西安那抛给美国；1853年俄国跟英法打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失败后又将阿拉斯加抛给美国，让美国这个“渔翁”捞了大便宜。

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更多的人接受

1848年，面对资本主义大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治理世界的新世界观，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英国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曾对它修正并使其略有延缓——已入穷途。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需要整体性改革现有世界治理体系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中国方案紧密结合的，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的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当然也融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对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好，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融合东西方文明优点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的中国逻辑将日益为世人所接受。总之，文明交流交融才能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面对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思潮，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话语——

发达国家怎样谋求国际话语权

左凤荣 刘勇



域外镜鉴

掌握国际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依靠正式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将蕴含一定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等因素的话语“渗透”到国际社会中，通过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制定规则和标准，并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民众的认同和接受。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领域处于优势地位，这是由历史形成的，后来崛起的国家要在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争得自己的地位，需要一个过程，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必要的。

以国家实力为基础谋求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掌握着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使国际社会在价值取向、法律体系、制度安排、舆论导向等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之所以积极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构建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享有比英国更且更长久的国际话语权。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利益已经跟随美国大兵遍布世界，美国的利益扩展至全球；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有超强的实力，在战争期间美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15%，战争结束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诺贝尔奖获奖数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学数量、世界500强公司的数量等方面都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美国维持其国际话语权的基石。美国充分分享现行国际体系对自己的好处，尽量少承担责任，当他国有益于己时，美国再出面，并获取更大利益。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频繁“退群”，似乎表明他不重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仍以其超强的综合实力、遍及全球的媒体影响力，占据国际话语霸权地位。在制度性话语权方面，特朗普在“退群”的同时，通过多个双边贸易协定构筑自由贸易联盟，试图塑造一个零关税的自由贸易体系，搞“发达国家超级自贸区”，七个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将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这显然是向WTO机制发起的重要挑战。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已经

达成新贸易协定，欧盟与日本签署了自贸协定，美国与日本也签署了贸易协议，美国与欧盟在商讨自由贸易问题。同时，美国也在努力保持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优势地位。这表明，美国仍要主导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制度性话语权。

“话语”的内容能够打动人和吸引人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增强国际话语权不仅靠实力，还要靠话语内容有吸引力，能够得到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认可。这就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旗帜。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有优势与其近代以来主导着世界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相关，其倡导的一些理念适应了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之际，发达国家也有危机感。2017年1月就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维护美国国际话语权方面以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言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特朗普不管其他国家是什么态度，完全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服务于其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其特点是要价高，务实性强，掌握主动性，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特朗普善于设置话语议题并掌握主动权，吸引着全世界的眼光。面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思潮，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话语，比如，在国际经济领域从过去强调“自由贸易”到现在强调“公平贸易”；从过去强调“自由竞争”到现在强调“竞争中立”。特朗普强调各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要为美国的工人争取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议，要求其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向美国的标准看齐。如果其他国家没这么做，美国便采取单方面惩罚措施，如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等。特朗普善于“公平贸易”的议题得到了本国民众的认同，也被欧盟和日本所接受，美日欧三方已经签署了六份关于贸易的联合声明，都强调公平贸易。韩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都与美国重新签署了经贸协定，向美国开放市场。

国际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征，如概念的创新、话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需要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作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的优势地位，与其发达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学理基础分不开。当前，特朗普等奉行的许多理念是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相违背的，其之所以还在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具有超强的国力。



能够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把自己的“话语”传播出去

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话语内容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具备强大的媒体传播能力。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总是动员各种资源，通过多种渠道的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并且用世界多数国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建立自己言辞的信任度，使自己的话语“有人听”。

从当今发达国家话语传播的经验看，新媒体具有快捷、迅速、更易于被受众接受的优点，灵活运用新媒体有助于在国际上传播自己的话语。发达国家特别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美国技术先进，是新媒体最早出现的国家。脸书、推特等新媒体的崛起对张扬其话语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特朗普充分利用了新媒体，以较少的投入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在当今世界，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大国话语之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朗普是大国首脑中会利用社交媒体的领导人，他所推行的“推特外交”被一些人看成是不严肃的表现，也引发了国际社会一些舆论的讽刺和耻笑，但特朗普并无任何改变，他平均每天发七条推文。特朗普的推特被世界广泛关注，其传达的信息影响着大国关系和世界市场。

在强势的西方宣传平台的鼓动下，美欧左右着国际舆论的风向标，掌握着对国际性事件的话语控制权。发达国家的媒体之所以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国家的媒体都是以独立、自由的面目出现的，被认为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中立者，被认为是相对客观的。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善于把舆论性话语权转变成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和舆论性话语权都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面，但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主要是制度性话语权。西方媒体的话语优势不仅仅反映在信息的流量和流向中，更表现在议题设定和评判标准方

面。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是国际话语权最为核心的部分。提高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使舆论性话语权所反映的诉求通过一系列机制性安排，成为国际通行规则。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受众多内部问题的困扰，全球治理的意愿在下降，美国频繁“退群”，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等，“退群”意味着不承担国际责任和不用承担相关费用，国际社会治理的赤字突出，但这并不表明西方强国在放弃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相反，美国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国内法对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长臂管辖”，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世界。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对国际机制采取了“有利则用，无利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破坏世界贸易秩序的正常运行。特朗普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高关税，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挑起贸易争端。

从当代世界的全球治理情况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共同价值理念，保障了战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发达国家在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起了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际话语权的态势也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发展中国家增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契机。国际秩序的变革成为世界的共识和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后起大国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进程中，需要摒弃资本主义强国长期奉行的实力原则，在话语权问题上更应站在道义的高点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正确的义利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捍卫现行国际秩序等新理念，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使中国在国际舆论界占有道义优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全球经济治理、金融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建设性甚至引领作用。中国努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增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积极创设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具备了一定的制度影响力。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话语权的大国博弈的经验还远远不够，加强对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分析和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



观点速递

数字经济三个定律将影响中美竞争格局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世界政治研究》撰文指出：

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和跨越性的增长特点。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受三个定律的支配：

一是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价值以网络节点/用户数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联网用户越多，每户价值就越大。财富量的增长等于用户数的平方，即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2013年，“谷歌光纤”在美国推行，之后向非洲、东南亚等地推广，于是4G网络建设在全球开花。4G网络的普及，使得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自2013年起，网络公司不断地将能源和金融企业从世界前几强挤出去，2015年起前三大的世界企业就都是网络公司了。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企业分别为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伯克希尔、脸书、阿里巴巴、腾讯、摩根大通以及强生，其中七家为网络公司。梅特卡夫法则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也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将聚焦于数字世界。

二是达维多定律，即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新产品只能分享其余的50%。这就形成了数字经济垄断性竞争的局面，世界网络公司很多，而这七家公司分别为美国五家和中国两家。达维多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垄断性竞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竞争中很可能形成中美两极格局。

三是摩尔定律，即芯片的处理能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虽然第一个进入市场的第一代新产品占有50%的市场份额，但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快。例如，手机通讯的1G时代是摩托罗拉为全球霸主。2G时代到来，诺基亚凭借机身小和显示屏迅速称霸全球市场，淘汰了摩托罗拉。3G时代的初期是群雄竞争，但后期则由苹果称霸，苹果还成功地将其主导地位延续到4G时代。摩尔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超越性竞争特点。这个特点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并不是一次性的技术优势，而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左明仁)

把乡村振兴放在全球视野下考虑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接受《农民日报》记者采访中指出：

在外部贸易摩擦升级情况下，我们还在努力争取消化掉不良因素，稳在由新入常这个平台上。需要农业和其他产业一起，形成由新入常转换的支撑力。新的动力就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使中国的结构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稳在中高速上。最好能够达到6%左右，这样十年时间，足够我们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了。按照世界银行现行标准，要达到1.2万美元以上才算稳住，才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世界银行每隔一段时间要调高门槛，所以说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要努力达到1.3万美元。

按照伟大民族复兴的两步走，到中国梦想成真这个时点来看，也就是30年。这30年的挑战性，我们要充分重视。中国农村是在整个统一市场之内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个国民经济是有机结合的，必须冲破思维定式，把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放在统一市场里，放在拥抱全球化视野里，放在中国农产品越来越来越多加入全球竞争中，来考虑高质量发展。

未来30年，要把中国农村的发展，坚定不移地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打通，这是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农村要加入进去，农村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乡村治理、财政预算管理、公众参与机制，都要发展，发展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农村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和拥抱全球化等方面的发展，看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思考。(曹夏红)



世界视野

供图/古然